

中央周刊

張文伯主編

第八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如何造成建國的士風？

王新命

抗戰既勝，建國當期其有成。建國之必以三民主義為大經，固無疑義，但只把三民主義的演講背得爛熟却不去實行，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決不會自天而降。現在我們的大患，不在於大家不了解三民主義，在於大家的奉行三民主義不力，理論與實踐，斬成了不相關連的兩塊。這不僅政界為然，學界也是一樣。現在學界的情形和南宋的情形幾無異致，讓我把對於南宋情形的批評略為介紹：據「鶴林玉露」卷五說：「以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於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所未有也。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材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讀，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南宋士人的高談堯舜文王周孔，等於時下士人的高談國父和蔣主席，南宋士人的必讀語孟中庸大學，等於時下士人的必讀國父遺教蔣主席言論集，結果南宋固有「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的悲哀，而我們此時却也同樣遇到「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的災難。如果細察其原因，便會知道：就南宋那個時代來說，堯舜文王周孔，並非不可矜式的人物，語孟中庸大學，並非不可讀的書，其所以士風日陋，人材日衰，是因為當時士人，知行不能合一，其屠兒禮佛倡家讀禮的風氣，只能使人相率而為偽，而此時的我們士人，則至少有一大部分正躬蹈南宋士人的覆轍，其高談國父和蔣主席，是等於屠兒禮佛，而其研讀國父遺教和蔣主席言論，則等於倡家讀禮。惟其如此，我們現在的大患，在於崇拜國父和蔣主席者甚多，而行國父和蔣主席之行者甚少，熟讀國父遺教和蔣主席言論者甚多，而秉國父遺教和蔣主席言論集以經國施政者則甚少，口頭講主義，紙上說建設，按諸實際，則有類海市蜃樓，徒然令人感覺其虛無縹渺而已。

為什麼會發生言行斬成兩塊的現象呢？原因雖多，要以高級幹部的用人

尺度偏重於黨義的講解為主因。用人尺度如此，所以善於講解黨義者，恆得擢用，其不善講解黨義者，多遭遺棄，結果士人研究黨義，但務講解，純粹藉它來釣名獵官，並不準備付諸實行。

這種情形，和賈似道的汲引道學，有點相同。賈似道汲引道學的流弊，是極大的。癸辛雜識引沈仲固之言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適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為賢者，則可以鈞聲致騰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始可以擢巍科，為名士。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沈仲固此時如果從幕裏爬出來，那就會發現今日三民主義的「道學派」，也是同樣的做法，只要看「三民主義講演，建國大綱，中國之命運」建一座中山堂或中正堂，開一條中山路或中正路，衍輯一兩本關於黨義的書籍，就變成了「賢者」「名士」，「可以鈞聲致騰仕」了。

其實，喜歡研究黨義，崇拜國父和蔣主席，固無可厚非，但研究黨義而不能行，研究有什麼用處？崇拜國父和蔣主席而不能體其志努力實現其理想，崇拜又有什麼用處？

宋袁襄對於道學的偽信徒會有一段痛心語。他說：「周衰，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昌言以距之。……今之偽者則不然，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則徒蹈之所不為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欲，剿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膚淺倣效之論，翕翕營營，如沸如狂。」這話也適用於今日。在今日也有人假黨義學者的美名

以濟其饑寒窮奇之欲，也一樣是剝奪國父遺教蔣主席言論，以文其膚淺做惡之論，名爲三民主義的信徒，却做了盜跖所不爲的事，這種風氣如果不設法改變過來，那就不止我們的建國不能成功，甚且還會弄到亡國亦未可料。因爲歷史告訴我們：清談終於誤晉，偽道學也送了宋室的江山，我們要建國，便必須先有建國的士風，士風如果流到虛偽無著落的一途，便不是建國的士風，現在我們士風已經流入清談和偽道學的歧路，我們又安能不警惕呢？

此時我們士風最壞的一點，是沒有革命的精神。革命要破壞也要建設，破壞要替建設鋪基礎，不是止於破壞，建設要以實現三民主義爲依歸，不是止於粉飾太平。這都需要發揮革命的精神才做得通做得徹底。過去我們之所以幾乎沒有一件大事做得通做得徹底，就是一般號稱革命者沒有革命的精神。沒有革命的精神，則難了解三民主義，便也等於不了解，號稱爲革命而奮鬥，便也等於不奮鬥。我說這話，也許是會招致誤解的，不過在我也有其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的苦衷，我覺得現在一切的革命理論都沒有錯，錯處在於理論和事實始終沒有打成一片，而其所以理論和事實不能打成一片，一句話說乾淨就是許多三民主義的信徒，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一點都沒有革命的精神。

別的且不說，建設的首要是在民生，而民生主義的建設，則以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爲出發點。然而試問什麼地方的私人資本已經受到節制，又是什麼地方的地權已經得到了平均？

馬援說：「大姓侵百姓，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尙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是以爲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謝病去。今之君子，欲以區區之禮義廉恥，戒大姓之暴虐民者，計亦疏矣。」當時的太守，就等於今日的市縣長，然今日的市縣長之能爲曹操者，尙無幾人，其不如曹操之尙敢除殘去穢於先者則更滔滔皆是。我們不論到什麼城市，生活都要受豪商巨賈和地主房東的壓迫，所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不過在紙上攪得很熱鬧而已，那裏還捉得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影子。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的大本，然而我們卻沒有一個地方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已由理論移諸實行的地方。宋儒羅大經說：「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我們也要說：今之富者大

抵皆姦富，這些姦富現正橫行國中，在城市則壓榨一般的市民，在鄉村則壓榨一般的農民，號稱革命者對於這現象如果竟熟視無睹，那又何貴乎革命？革命以來，人民對於許多革命要人，其最初屬望之殷，與其後失望之甚，殆有甚於南宋時人之於真德秀。南宋時人民以爲「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然其後真入參朝政，無所建，於是大家都說：「若要百物賤，須待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得一饅頭。」而士子且有斥之爲「真西山之餓夫」者。固然革命大業，並不能立就於倉卒之間，盛名難副，也不能專怪革命要人，但許多人望所歸的要人，却沒有幾個能在建設事業上做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或樹節制資本的楷模，或奠平均地權的基礎，這總不能不怪這些革命要人的能言而不能行。

革命要人是中下級幹部的表率，既多坐言而不起行，中下級幹部的必然唯唯諾諾，一事無成，也就是自然的趨勢。同時一般士風之必流於虛偽，更是天然的演進。

可是，現在正是國家強弱，民族盛衰的關鍵所在，建國能够成功，才有國強族盛的希望，否則必淪於國弱族衰的地獄，我們還能再在動口動筆而不動手的語言文字建國圈裏打斛斗麼？如果不能，那就必須振作其革命建國的精神，造成其革命建國的士風，力矯理論與實際斬成兩瓣的積弊，然後才能够達到建國的最後目的。

這是要由高級幹部先做起的。因爲「長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上行下效，才容易做得通。

如果問：究竟要從何處做起才會對？我的答案是：

第一：要了不了解不妥協的意義。能够了不了解不妥協的意義，沒有一件事做不通。例如：抗戰不是艱鉅無比的事業麼？但是因爲領導我們抗戰的蔣主席，老早就了解如果中途妥協就是滅亡的意義，並以其先知覺後知，以其先覺覺後覺，漸漸做到了全國上下都了解這不妥協的意義，所以終於招致了最後的勝利。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不妥協的精神，建國成功的主要因素，也將是這種不妥協的精神。用不妥協的精神，來推進地方自治，來實施民主憲政，固無不成之理，就是用在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方面，也同樣能够成功。理由很簡單：我們地方自治之所以不易進到理想的階段，是太對土豪劣紳妥協的結果，我們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辦法，所以苦無着手之處，是太對私人資

本家和地主妥協的結果。只要我們能够不安協，我們便可以打倒土劣，並使資本家和地主就我們的範。革命者不能對革命的對象下旗息戰，對革命對象息戰，就是投降，就是不革命，現在若干革命要人向土劣，資本家，地主投降的傾向實在太顯著了，必須立刻把他矯正過來，革命才會得救。

第二：用人應該不專取長於黨義八股的人物，要察言觀行，加以任用。所用的人以能做敢做快做為原則。從前朱熹把做事與道分成兩派。他說：「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

請聽來自同學的呼聲

文伯先生尊前：我們是戰地青年招訓會保送考入南京臨大肄業的兩個流亡學生，平日對於報紙雜誌有相當的愛好，因為要認識現在的世界，現在的國家，現在的社會，對於有時間性的期刊是不可不讀的，可是，到那兒去看呢，我們都是窮學生，我們的吃飯都是公家供給，那有閒錢來訂書訂報，至於說借，那有這麼容易，況且我們所認識的未必都是愛好書報的人，精神食糧缺乏的痛苦並不能於沒有飯吃，公理或定理之外需要更多的常識，孤陋寡聞下去恐怕要變成「營養缺乏」了。曾經看過 先生主

編的中央週刊，覺得內容很適於我們的要求，不知 先生可否給我們一個優待的辦法，這也許是一個不情之請，可是 請你原諒這是為一點小小的求知慾，假使 先生能以數行，更是我們所感激不盡的了。專此

敬請
大安

學生 紀增輝
張樹生 謹上

！學獎刊訂迎歡

通訊處：本市成賢街文昌橋大南樓二一四號

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無事，則晚間就可下手。李紱却駁道：「天下無道外之事，即無事外之學。早間有事，即從早間事上做工夫，午間有事，即從午間事上做工夫。未有離事而有工夫者。」我贊成李紱的意見。我相信離開行動沒有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不在口頭和紙上，是在行動之中，所以只有能照着三民主義方法去做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三民主義的人，也只有這一種人才有益於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一些不能做只能說的黨義販子，都是三民主義的偽道學，一點都沒有用處，過半建國工作之無多成就，就是因為這種不能做只能說的黨義販子太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後不能再多用這一類的人物。

第三：必須肅清貪污，樹廉潔政治的風聲。要做到這一層，便必須出於下列的兩途。其一，能為肅清貪污而懸幾個權勢的頭於市中，不再要竊鈎者誅稱國者侯的老把戲。其二，讓有錢的大官獻出過剩的財富供建國之用，或是暫時請他滾蛋下野。現在貪污所以成風，一半是法制不够密，執法不够嚴，刑不及特任，已成習慣，所以大家玩法而無所忌憚，一半是因為若干大官已富，其餘大小官吏也正望富，大家的目標是做財富不是革命。大官太富，而我們所得稅等等稅法，又鬆弛無力，不能加以約束，如果不請他獻出過剩的財富或暫時滾蛋下野，那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辦法就永遠無法實施。別的不說，去年六全大會不是通過了都市土地國有案麼？這案為什麼好像石沉大海杳無消息呢？原因簡單得很：大官太富了，他們不願連自己的資本也受節制，連自己的地權也受平均。事實如此，則在太富的大官獻出過剩財產或滾蛋下野之前，不問是誰如果請他實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辦法，就都等於與虎謀皮。事實如此，現在第一要使懲治貪污的法，能够有效地發揮，特任官也好，特任以下的官也好，只要貪污有據，都應懸頭於市，其次，要使富官獻財或自己滾蛋下野，不做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障礙物。必如此，然後廉潔的政治風氣才可能造成，蓬蓬勃勃的建國朝氣，才有其發生的土壤。從前政論家的觀念是：「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現在政論家的觀念，應該是：「政治之壞，由官富也，官之致富，賄賂行也。」廉潔政治之不成，民生主義之不行，均坐此故。企予望之，庶幾改之。

信能如此，政風可變，政風能變，士風必變，士風不變，建國乃能必成。我希望我這罪言，能够發生一點振作士風的作用。

由明治維新到昭和維新(中)

鄭學稼

——從柏理提督到麥克阿瑟元帥——

三

我們再看維新後的建國工作。

充滿光明前途的明治政府，深知欲立國於世界，應廢除數百年的陋習，澈底地改革。牠，換句話說，就是歐化。正似「大化革新」者要使整個日本接受隋唐的文化，明治維新者也努力使日本接受西歐的文化。這過程的開始，是斷然廢除等級的制度。在等級顯然地嚴格地區分的社會，永久不會出現以發展資本主義為任務的政權，因為資本主義有「自由勞動」的前提。要供給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自由勞動者，新政府不能不除藩制，牠就是令藩主奉還版籍，並廢藩置縣。人民既非藩主的私奴，而是國民，那就不能允許還有過去無姓的陋習，於是許庶民稱氏，不許「武士」(牠也取消了)佩刀。廢止「多非人」，和徵兵制度等，相繼頒佈。

與「自由勞動」同時存在，並應促進及保護其發展的，是資本。適應這一要求，明治政府頒佈股份條例，改革幣制，許土地買賣，改物租為錢租。資本的積疊，不能缺乏場所，為牠，明治政府保護民族工業，並許人民建築鐵路。不難想像，上述的設施，在西鄉隆盛派未壓服前，在不平等條約未取消前，不會有顯明的效果。事實也是如此，明治初期的資本主義化運動，只便宜了三種人，那就是，協助維新的舊財閥(如三井)，有維新之功的新官僚。和與官僚相勾結者(如三菱)。另外，無謂說還有皇室。窮困的天皇，由沒收幕府的財產，變為大地主，並準備充當新日本的大資本家。

這種障礙日本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需要掃除。掃除的唯一手段，是建立民主政府。當維新開始時，京都的天皇，已許「萬機決於公論」，到遷都東京，還頒佈新聞紙條例，許言論自由。如果日本當時就有大政治家，和民間有遠見者，那很容易使明治政府逐漸走上民主的道路，但事實却非如此。反對西化的頑固派，在西鄉隆盛領導下，企圖以武力改造政府，沒有以言論或別的民主方式糾正政府錯誤的遠見。造成西鄉派那一行為的動力，明治政府也應負大部份的責任。因為西鄉派的行為，雖背反歷史要求，但他們個人的人格，與典型武士的生活，恰與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們之奢侈貪污相對照。明治初期政權的貪污腐化，雖然根源於過去的陋習，並將變為黑格爾所說：「如嬰孩時代的鞋子」，但牠的拋除，決非短時間所能實現。

自西鄉派以武力糾正明治政府的工作失敗後，反大久保政權者，突然有這感覺，不能再以武力為政爭的工具，因為日本需要統一。我們不滿當局的目的，既不是他們所推行的政制，而是他們在推行中的工作，並未完善，那我們應設法糾正牠。糾正的手段，依一般歷史的指示，叫做民主運動。明白這一點的，反大久保派，和留法的擁護派，以土佐的板垣退助為中心，展開爭取民主的要求。他們設立「國會期成同盟會」，到處演說，刊行小冊子，介紹民權主義的著作，並上書天皇。儘管警官隨時阻止，但他們的運動却如火燎原，終迫使明治於一八八一年召集廟議，決定「開設國會」的日期。

為什麼，開設國會，須經過準備的階段呢？日本當日的情况，確有這需要。她不是共和國，而是如軍人勅令所示：「兵馬大權朕親掌之，不與臣下」的君主專制政府。這類政府怎樣民主化，首先要規定君主的位置，即制定憲法。因此，所謂準備工作，即制憲。負這巨大任務的為伊藤博文。他率隨員赴歐，親受教於普魯士憲法學者斯泰因。伊藤氏對這個工作的功罪，目前已十分明白。為著日普統一運動都是「由上而下」，制憲以普為藍本，以斯泰因為師，這是他的眼光，也是他的功勞，但在憲法上，規定牠的「欽定」性，並為着天皇的統帥權，允許武人的「帷幄上奏」。這是他的罪。「帝國憲法」，頒佈於

一八八九年，各式政黨也於同年產生，到翌年十一月，舉行第一屆國會會議。

日本民主運動的時間，前後計十年。雖然，民主運動者所爭到的，僅是「欽定憲法」，但依日本的客觀情況，那已够了。這種憲法，儘管本質上不够民主，而由於日本的民主目的，在於監督政府，促進政體的廉潔，與資本主義秩序的建立，他却可以滿足了許多人。

民主運動的終止，使明治政府無內顧之憂地，向各方面發展。可以如此說，到十九世紀行將結束時，日本民族在軍制，教育，工業各部門，均以最大的速度，接受西化。牠使明治政府日益強大，牠使日本民族增長了自信力。這種環境，必然發生對外的糾紛。牠的客觀目的，是解除柏理提督強迫開國後所訂之不平等的條約。一個民族，要求與壓迫牠的其他民族處於平等的地位，不是靠懇求與卑恭，而是依賴自己的實力。當時日本的最好表現，是對外戰爭。牠的對手，自然是中國。

說到中國，她是日本民族的恩人，又是亞洲的大國。就道義說來，日本民族對她應感恩圖報的，但事實上却非如此。自第七世紀起，日本會和她發生過多次戰爭。同時，中國有過多次侵略日本的機會，為着牠的寬大，而任日本恢復實力。這兩個命運上註定要為東亞主人資格而鬥爭的民族，彼此間的關係，從千餘年的史實，可以歸納為一個規律：當中國強大時，牠的勢力，常擴張至朝鮮半島。牠不是征服那半島，而是充當朝鮮民族的保護者。保護的目的，即避免日本民族的武力侵略。日本能否向外發展，係決定於內部是否統一。一旦統一，馬上以半島為侵略的對象。每次侵略之能否成功的尺度，又不是日本的實力，而是中國的強弱與朝鮮內部是否分裂。若使，當日本用武半島時，適逢半島統一，那牠的侵略不會成功。反之，當日兵侵略半島時，半島民族，正忙於內戰，那牠的武力就可深入，可是這種突入的期間，要看中國的力量。如果，中國的國勢正向上發展，那日本民族的北進，就受阻遏；反之，就可以充當朝鮮的主人。

第一次中日的戰爭，始於唐初。受隋唐文化影響而統一的日本，於第七世紀半，不斷侵略朝鮮。那時半島分為百濟，新羅，高麗三國。一個民族當陷於內平時，常有一部份人倚賴外族，因此，百濟以日本為後盾，與高麗聯合攻擊新羅，新羅則求援於中國。中國這時候，正當唐王朝強盛的時期，不僅有力量平定半島，還有實力懲戒那文化上的背叛者——即日本。六六三年，中日兩軍決戰於半島的白村江，日本海軍全部覆沒，陸軍亦為劉仁軌軍所殲滅。這次大懲戒，使日本放棄北進的念頭，達數百年之久。第二次中日戰爭，即十二世紀八十年代，元師征日無功。第三次戰爭，在第十七世紀。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利用西洋傳入的槍炮，深入朝鮮。中國應朝鮮的請求，派軍馳援，由於時當明朝中衰，無力一舉驅逐日寇，但却使日本民族知難而退。第四次，即現在所要論述的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的歷史目的，是日本向中國爭取亞洲的霸權，爭取的第一對象，自然是朝鮮。陷於崩潰的李氏朝鮮，本身無力抵禦日本的進攻，只靠中國，因為她是中國的藩屬。雖然，自一八四二年起，中國的四境藩屬逐漸為人吞併，但在當時統治者——即滿清的皇族眼中，却無新起日本染指的機會。日本如沒有強大的武力，或經過武力的使用，要迫隨英法俄之後，割取滿清王朝的藩屬，那是不可可能的。

日本在當時確有那實力。牠的海陸軍，在數量上，雖不及中國，却經過新式的訓練，尤其是受英國教育的海軍戰術家東鄉平八郎，有以劣勢艦隊取得戰果的把握。此外，牠的輕工業已經蓬勃，人民亦知愛國，更重要的，他們上下一心，明白如無朝鮮半島，維新的鴻業，即將曇花一現。返觀中國。在滿清統治下，大多數人民抱着不滿的情緒，那裏沒有工業，只有若干官辦的工廠，政治的腐化，徒擁中興之名。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雖被鎮壓，而農民的叛變浪潮，並未平伏。這一點，已够說明中國的失敗。因為，在對外戰爭中，有內部分化或潛伏分化作用的民族，絕不能獲勝。果然，自高陞號被東鄉艦隊擊沈起，中國海陸軍節節失敗。北洋艦隊，事實上等於消滅，陸軍幾乎退至山海關以東。

日本戰勝了，並報復六六三年的恥辱。是否利用戰勝之威，迫北京，使滿清作城下之盟呢？抑完成豐臣秀吉的志願，使明治天皇充當中國的統治者呢？日本的政治家們，十分聰明，並有眼光。他們自知沒有那實力，和理解國際的條件，接受滿清的求和，訂立馬關條約。牠的內容，是中國割讓台灣，放棄朝

鮮的宗主權，和許日本勢力深入滿洲，即佔有遼東半島。後一戰利品，到俄法德三國起而干涉時，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家如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能够在大本營中，力排衆議，忍辱地自動放棄。因爲，他們都明白：日本民族能否獨霸東亞，甲午之戰，算是一串史劇的開始，雖然中國退出競爭的舞台，却另有大力者即俄國在北滿。沒有打倒他，就佔有遼東半島，也不能取得歷史的成果。一個民族，常因缺乏偉大的政治指導者，失去歷史給與的果實。若使日本反對三國的干涉，那她很難有一九〇五年的良機。

勝利給日本的作用，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如此說：明治維新的成功，等於告訴世人，在東亞，有一國家，叫做日本。甲午戰後，那三島的日本，却有資格稱爲遠東的強國——可是還要經過一次試驗。她所以因戰爭而強大，爲着中國退出朝鮮和割讓台灣，刺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中國巨額的賠款，使日本改爲金本位，亦可促發資本主義的發達。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市場的獲得，解除農村破產的威脅，並迅速地使日本民族，適應地而作種種的改革。她就是政治修明和文化發達。

四

日本民族的向外發展，必須貫徹一個殘酷的信念，即犧牲中國。因此，中國的災難愈多，日本的利益愈大。本來，滿清王朝，已經危機四伏，自被三島之大的小國打敗後，內在的矛盾更加劇烈。對於這一點，康有爲們頗爲明白。自擊膠州灣（德國強佔），旅順大連（俄國計取），威海衛（英國強租）和廣州灣（法國強租）的陸續被佔，他們有這認識：外力的壓迫，可以鼓勵內部的分化。分化的結果，並促外力的深入。只有一個補救的辦法，即改造中央王權，使她適應新時勢的要求。這辦法，即後來的「戊戌變法」。可惜腐化的滿清，不能使光緒皇帝，充當「第二大彼得」，而推動變法的六君子，却以酒染菜市草原的血，塗寫由上而下改革之不可能。

如果中國在當時不能有由上而下的改革，那就要採取由下而上的革命。這是民主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所定的道路。當他爲牠而奮鬥時，滿清王朝又發生因帝國主義商品破壞作用而釀成破產農民仇外的運動——即義和團事件。淫蕩老嫗（西太后），不是看中了這個運動的內容，而是陶醉於牠的形式。對她的幻想，即以符咒趕走「洋人」的第一個訓者，不是「洋人」，而是此後不斷唱着「同種同文」調子的日本。她利用這一良機，以曹肥生杉山彬被殺爲口實，派福島安正和山口素臣兩將，率軍攻擊北京。「皇軍」的「武威」，迅速她宣揚於滿清的京城。這不僅使他們用劫掠方式，奪得許多戰利品，而且獲得英國的寵愛，助她解除神奈川條約的所有束縛，並於一九〇二年訂立第一次日英同盟。

庚子之後的中國，確不足爲日本患。這一點，日本的政治家十分明白，但中國陷於瓜分豆剖的危地，就當時情況說來，不一定就有利於日本。因爲她的實力，才及於朝鮮的南部，要進一步收獲糧食的效果，還須與朝鮮北部事實上的主人，即俄國從事鬥爭。

理解這一歷史前途的日本政治家，開始利用英俄在遠東對立的局面，訂立日英同盟。此外，又利用俄人虐待猶太人的機會，拉攏在美國的猶太資本家。俄國政治家中，很少知道日本的潛在力。更糟的，是俄皇左右的人物，既昧於世界情況，又極其輕視日本。俄皇的寵臣巴梭布拉速夫（BizoBrazom）既忽略國內工農的反亂運動，又不顧西比利亞鐵道未完工的不利條件，鼓勵俄皇獨佔遠東。聽信巴梭布拉速夫話的尼古拉，拒絕山縣有朋劃分朝鮮勢力的建議，並目中無人地在答復日本公文上寫道：「我們已是滿洲的主人翁，朝鮮吧，容我們再看看。」

爲什麼，俄國的統治者敢說自己是中國滿洲的主人呢？因爲利用義和團的事件，俄軍的鐵蹄已踐踏中華民族稱爲「白山黑水」的區域。他們企圖永久地佔據這一地方，完成大彼得在東方開一「窗子」的宿願。

日本明白俄國獨佔滿洲的行動，爲英法所不滿。她就慷慨地充當「英國在遠東的看門狗」。但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有反抗俄國的實力嗎？有的。她的陸軍，自甲午戰後，由七個師團增至十三個師團，海軍由五萬噸增至二十萬噸。關於內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稱爲「資本主義之父」濼澤榮一指導下，極爲可觀。

有了上述的力量，她方敢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對俄宣戰，時距明治維新不過三十七年。

日俄戰爭的區域，不在各自的國土，而在中國的滿洲。開始，日本的海軍，在東鄉平八郎統率下，於朝鮮打一勝仗，接着又封鎖俄海軍根據地旅順。海軍的勝利，便於陸軍的活動，日本的陸軍，也迅速地由半島而進入滿洲，到當年十二月，俄國軍事家誇為「難攻不破」的旅順，入於乃木希典之手，翌年三月，奉天會戰，俄將克魯巴特金向日帥大山巖低首。現在，俄國只有最後的一張王牌，即遠道東航的婆羅的艦隊。她於一九〇五年五月，也在日本海為東鄉所殲滅。

日本勝利了，但不是絕對的勝利，因為她的國力已消耗了大半。明白這危機的日本政治家，力排國民的情感，決定接受美總統羅斯福 (Theobors Roosvelt) 的和平請帖。結果，訂立樸資芬斯條約。依這條約，日本只取得南庫頁島，南滿鐵道和旅大。我們應該知道，若使日本當局依一部份國民的意志，繼續戰爭，那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蘇維埃運動結束後，不會有更大軍事上的勝利。其結果，恐怕連樸資芬斯條約所給與的利益都沒有。在這裏，可以看出政治家，對一個民族的關係。

戰勝俄國後，日本在國際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她不僅是東亞的強國，而且是世界的強國。這新興的國家，到一九一〇年正式吞併朝鮮時，她的發展，已達於最高峰。也就說，日本民族由於完成明治維新的鴻業，漸出為東亞各民族所羨慕的喜劇。這新興的國家，到一九一〇年正式吞併朝鮮時，她的發展，亦無論走哪一條路，正在發揚的日本資本主義，却須侵略中國。因為，侵略中國愈成功，日本資本主義生產力，由於商品之固定大市場的獲得，愈加發展，亦即愈有實力完成「南進」的圖謀。

其是，受侵略的中國，雖於一九一一年推翻了滿清的統治，建立共和國，實際的情況，却是繼續分化，而不是統一。當中央政權崩潰後，地方政權逐漸獨立。即一二十一條件。接着，又暗中利用可以軍閥，從事內戰。可惜這些圖謀，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因為，受了四分之一世紀災難的中華民族，已能起來，高唱日本帝國主義的喪歌。

我們早不知道：明治維新的歷史工作，自吞併朝鮮後，已經結束。明治大帝，也於併韓後兩年駕崩。繼續的天皇，於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改元大正。大正在位不過十五年，却洩露日本民族各種危機。可以如此說：自大正元年起，日本民族走着下坡路。雖然她還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於巴黎和會中獲得若干權利，如佔領青島及散處太平洋的島嶼，但不因這些獲得，而挽回歷史注定的厄運，反由之，潛伏後日促進民族沒落的禍根。沒有太平洋的委任島嶼，日本的領土，也許不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向美國挑戰；沒有青島的奪取，中華民族的興起，也許減少一個刺激。新的完成，開始下坡，中國却漸漸地蘇醒，他，促進日本的沒落。

中華民族之能蘇醒，靠着一九一四至一八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要曉得：一個民族之能否近代化，即能成否為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決定於該民族能否取得發展或完成「民族國家」所必需之資本主義生產力。日本由於明治維新，滿足了那一慾望，而且十分順利。中國呢？他為着一九一四年後的大戰，國內市場突然缺乏外人的競爭，民族工業開始發達。這一發達，必然地以日本為競爭的對象。於是，利用反對一二十一條件，及「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而這一偉大的運動，並高調提倡國貨（一九一九）。這是一串歷史工作的開始。真正地，自覺地，提出此後的歷史要求，則從反日運動中產生。後日歷史家，稱這一偉大的運動，稱為「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目的，如當時領導者們所說，是「民主」與「科學」。中華民族為這目的而奮鬥，要經歷艱難困苦途徑，要支付巨大的代價。因為，她的建立「民族國家」，與明治維新，有這不同之點：日本以「攘夷」為口號，真正的，在於「倒幕」。中國為完成內在的「統一」，要先「抗日」。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或歷史家，都會明白：中日兩國要經過一個血戰的階段。

揭起覺醒運動的旗幟時，東京政府，千謀百計地，暗中設法阻止。首先她協助北洋軍閥，希望撲滅北伐，到北伐軍抵達濟南時，她立即出兵山東，並演出「濟南慘案」(一九二七)。

不再生第一世界大戰那樣地懼怕中國國民革命的完成呢？誰如明白大正期間的情況，誰便理解那是必然的。日本資本主義，早自明治末期，顯露內在的矛盾，他因活動，需要市場，而一八八年的國際局勢，却限制日本帝國主義有兩條路可走，尤其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使她只能於經濟侵略原則下，向外「即向中國」。

口。第二，這不願國際的信義，破壞日本已有條約的性質，却以武力侵略中國，作改革的運動。改革，即徹底地改造農村，給農民以土地，容納過剩的人口。

不。大正時期，固不必說，陷於一籌莫展。這新興的民族，為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所束縛，失去明治期間的活力。但經工業家和大多數政治家，却指斥他。由於上述的原因，

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

本刊特輯

甲、協商會之前的協商

一、政府與中共會談歷史

——周恩來在協商會中的報告——

民國廿五年到二十六年間，中共代表與當時的政府代表，曾有會談，所談的中心問題，也同今天同樣的和平，是民主，所不同的，當時是要停止內戰，團結抗戰，而八年以後的今天，所要求的是停止內戰，團結建國。在抗戰以後的商談，多限於局部問題的解決，如陝甘甯邊區問題，敵後抗日軍隊的承認與編制問題，同時提出人民自由權利的要求。其時，政府方面也提出一些答覆，因為彼此意見距離尚遠，所以沒有得到解決。而最後一個時期，就是民國三十三年中共方面再提出解決全局的問題，即是三屆五次國民參政會上次參政員祖國代表中共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參政會後又經過幾度商談，在政府方面認為這種主張要動搖政府的法統，沒有接受。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便使糾紛繼續，也就伏下抗戰勝利以後發生不幸的內戰的根源。

抗戰勝利以後，新的時機來臨，蔣先生三次電邀毛先生，毛先生應邀來渝，就開始抗戰以後新的商談。這一個時期商談的原則，是從一般的談到具體的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十一項提案，然後政府代表逐項加以書面答覆。在彼此商談中，已經得到同意承認的紀錄下來，沒有得到同意的繼續商談，以

後遂有雙十節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簽定，其中還有幾個主要問題，彼此認為不必發表，因其尚未解決，要留待以後商量的。例如關於進兵問題，政府軍隊要求開赴一切敵佔地區受降，中共方面則要求有些原來由中共領導的武裝在那裏活動，已經解放了的敵佔地區，或已由中共領導受武裝包圍的敵佔地區，希望在受降問題解決之前，雙方部隊都暫駐原地不進，因彼此未能同意，所以會談紀要沒有列入。很清楚的，會談紀要公佈後，繼續衝突的擴大，其根源即在於此。就已經公佈的十二項中，也可以看出在此時期中是從一般的方針談到具體的問題的。而一般方針的解決，我們始終認為是雙十會談紀要的主要成功。（未得解決的幾個問題，如進兵，地方政權及受降等問題，繼續到雙十節後的會談也未有結果）

二、停止軍事衝突商談經過

——張羣在協商會中的報告——

第一 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商談時期

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政府代表向中共代表提出避免衝突恢復交通辦法後，經幾個星期的商談，又經幾個星期的停頓，至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方面提出三項辦法，主張無條件停止衝突後，政府

因此提出三項辦法：（一）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鐵路交通。（二）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礙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有之受降及遣送敵俘等義務有關，所有與停止軍事衝突恢復鐵路交通及其他與受降有關事項，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將軍從速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三）由參政會駐會委員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組織軍事考察團分赴各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隨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公布。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時，亦請推定公正人士參加。這個辦法與過去所提辦法比較有一個特點，就是把美軍在中國運動中國戰區辦理受降及遣送敵俘的問題，與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並作一事作總的解決。中共代表對上述辦法大體同意，經過兩次商談，在本月五日獲得一致的協議，作如下之決定：

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辦法：

（一）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並恢復一切交通。關於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條之規定商定之。

（二）因國內軍事衝突及交通阻礙等事，與我國對盟邦所負有之受降及遣送日俘等義務有關，故應由政府與中共各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將軍從速

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

(三)由參政會駐會委員及政治協商會議各推定國共兩黨當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組織軍事考察團，會同國共雙方代表，分赴全國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況，以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事項，隨時將事實真相提出報告，並公布之。

第二 政府代表中 共代表與馬歇爾將軍會商時期

這個會商自一月七日起至昨天本會議開會之前

止，共開會議六次。以五日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所同意的辦法為根據，共簽定了四個文件：(一)停止衝突命令草稿。(二)了解事項。(以上兩件係三人共同簽字的)(三)軍事調處執行部。(四)共同聲明。(這兩件是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簽字的)共同聲明的內容包括：(一)(二)(三)三個文件的要點。政府方面業已發佈命令，並照與中共代表所商定的時限，規定在一月十三日晚十二時以前，不分何地，一律實行。

停止衝突令：

「中華民國國軍，及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不論正規部隊，民團，非正規部隊，或游擊部隊，應即實行下列命令：

(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規定者外，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行動，一律停止。惟對於復員、換防、給發、行政及地方安全軍事調動，乃屬例外。

(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該項交通線之障礙物，應即拆除。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中國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國共產黨，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布之。

雙方並聲明，下開規定亦經同意，並載入會議紀錄內：

(一)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在揚子江以南整軍計劃之繼續實施並不影響。

(二)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境內調動并不影響。

(三)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一節內所云之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

(四)茲同意國民政府軍隊在上項規定下之調動，應每日通知軍事調處執行部。雙方並聲明，軍事調處執行部僅為協助中國委員實施停止衝突命令。

軍事調處執行部內設置執行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實施監察詳細辦法之實行。

軍事調處執行部各委員，得各別設置通訊線，足保迅速而無阻礙之通訊。

軍事調處執行部先設於北平。L

軍事調處執行部之設立

(一)軍事調處執行部是為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實施，和解除敵軍武裝及遣送敵俘的任務順利完成而設置的。

(二)軍事調處執行部設委員三人，美國方面已指定羅賓遜代辦，政府方面已指定軍令部鄭廳長介民，中共方面指定葉參謀長劍英。

(三)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辦事程序：三個委員各有一表決權，一切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對下發布必要的命令，對上報告，山所屬的執行組每日繕具，由各委員分送其首長。

(四)軍事調處執行部之工作，由執行組推動之，執行組主任由美國軍官擔任，督察有關部隊。有發布及宣達一切命令指令之權。必要地點並得設置分站，或派遣監察或報告小組。

(五)軍事調處執行部繼續存在，執行其工作至政府或中共方面通知廢止之日為止。

例外事項

政府方面提出以下三項不受停止衝突辦法的限制，須作為例外的，第一項是關於整軍的；第二項是關於接收東北各省的；第三項是關於接收赤峯多倫的問題。關於前兩項均商得一致的同意，第三項因中共代表堅決反對，五日午後會議未能獲得最後的決定。遂作最後的讓步，將此項提議併入熱察問題作整體的解決，在此次成立停止衝突會議的時候，不作為例外。

停止衝突以後

在三人會議通過全部議案以後，本席曾經建議依據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前經商定之三人小組

應速成立，進行中共軍隊的整編。停止衝突還未將問題真正解決，停止衝突命令發表之後，就要能迅速成立三人小組，關於中共部隊之整編及其駐地之規定，從速商訂具體實施辦法，付諸實施，那才算問題真正的解決當時馬歇爾將軍表示認為重要願以三人會議之一份子作迫切的建議，三人小組應從速進行。中共代表周恩來先生亦無異議。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

一月十日上午十時協商會議於陪都國府禮堂開幕。

協商會議代表：政府代表八人：孫科，邵力子，張羣，張治中，陳立夫，吳鐵城，陳布雷，張厲生。共黨七人：周恩來，葉劍英，王若飛，陸定一，董必武，吳玉章，鄧穎超。民主同盟九人：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章伯鈞，張中府，梁漱溟，黃炎培。青年黨五人：曾琦，楊叔明，余家菊，陳啓天，常燕生。無黨無派九人：王雲五，胡霖，邵從恩，傅斯年，莫德惠，郭沫若，廖雲台，李燭塵，錢新之。

這一會議集會了政府及各黨派與無黨無派代表三十八人，解決國內統一問題。協商是以去秋政府與中共會談要為重要根據，並尊重其他各黨派意見，謀國事的決定。蔣主席親臨主持，首先宣布停止衝突辦法已經商妥，停止衝突命令可以發佈，引起全場歡動，大家慶幸國家重大問題真正全部付與這個會場來解決。前途顯示更多的光明希望。蔣主席開會詞說明「本會議召集目的，是邀集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來共商國是」。而要求「這一次會議是要集中力量，「造成團結」，「扶助政府

，增強政府」，「開闢建國的前途，促使我們國家的進步。」

致詞完畢，又宣布政府決定實施的事項！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

「政黨之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

「普先」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

「政治犯」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張羣周恩來報告關於停止軍事衝突及恢復交通商談經過。繼而討論會議議程與軍事考察等問題，十二日第三次會議中即選出何鳴基，林可璣，王葆真，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任觀淇等八人為軍事考察團代表。

擴大國府組織

十四日政治協商會議第四次會議中，國民黨代表孫會員科等八人提出關於擴大國府組織之意見如下：

中國國民黨在國民大會未舉行以前，為準備實施憲政起見，擬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以充實國民政府委員會。其要點如左：

(一)國民政府委員就原有名額增加三分之一
(二)國民政府委員得由主席提請選任黨外人

士充任之。

(三)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

(四)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及議決之事項如左

甲、立法原則。

乙、施政方針。

丙、軍政大計。

丁、財政計劃及預算。

戊、主席交議事項。

己、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之建議事項

(五)國民政府主席對於國民政府委員會之決議如認為執行有困難時，得提交覆議，覆議時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仍主張維持原引議案，應予執行

(六)遇有緊急情形時，國民政府主席得為權宜之處置，但應于處置後報告國民政府委員會。

此外同時修改行政院組織法如左：

行政院設置政務委員若干人，政務委員得兼任各專會長官。

青年黨代表會員琦等五人，亦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實行政治民主化案」大要為：

政府的組成必須具備下列的兩個條件：(一)必須是全國性的即除國民黨以第一大黨的資格仍居主要地位以外，須包括全國的各重要黨派，以及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二)必須是有力量的，即參加這個政府的分子有黨的必須真能代表他們的黨，無黨的必須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賴。

(一)吾人主張改組政府的，吾人主張取銷國防

最高委員會代以中央政治會議，會員須經協商，由政府加以任命。(二)屬於政務執行機關的，吾人主張改組行政院，其他各院會以及有關財政經濟外交軍事交通各重要機構，其人選須包括各方面。(三)屬於人民監督機關的，吾人主張加強國民參政會，增加人數至五百名，並提高其職權，使其足以舉監督政府之責。

本日會議中對以上兩種方案，作廣泛討論。共產黨對政府代表提案有下列意見產生：

- (一)應有共同綱領。(二)應有最高的決策權(包括用人權)。(三)國府委員中國國民黨應佔三分之一。(四)過渡時期政府希望協商。(五)國府主席之緊急處置，須經委員會通過或設置小組，如常委會等處理。(六)各院部會應容納各方面人士。(七)黨費不能由國府開支。

在協商過程中，國民政府委員會就原有名額增加三分之一之建議，已獲各方諒解。惟委員會無用人權一點，共產黨方面主張國府委員會應有選派各部長之權。政府改組計劃草案，仍以領袖地位賦諸國民黨，並奉 蔣主席為 主席， 主席之職權，在約束及權衡制度之下，介乎美總統與英皇兩者之間，國民黨仍保有委任過渡政府之權，惟各黨派在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中，有決定政策之權，國民政府委員會將代替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為國家最高指導機關，並於預算上監察政府各部長。各部長除因預算上約束外，並不向國府委員會負責。

施政綱領的研討

十五日第五次會議，研討施政綱領，各黨派及無黨無派代表均無正式提案，僅作廣泛之交換意見

，較具體的意見為共產黨及青年黨所提出的：

- 董必武氏提出共產黨對於施政綱領之主張，為(一)和平建國基本方針；(二)人民自由權利；(三)擴大國民政府基礎；(四)籌開國民大會；(五)地方自治；(六)軍事改革；(七)復員善後問題；(八)財政經濟之改革；(九)文化教育之改革；(十)國際和平及安全。

常乃惠氏代表青年黨提出施政綱領之意見，其原則為：(一)扼要勝於鋪張；(二)現實重於理想；(三)除弊重於興利。內容要點着重願及(一)國家的統一與安定；(二)中國對世界之責任；(三)整個制度的配合與運用；(四)民主自由之基本保障；(五)人民的經濟能力扶植；(六)教育文化之充分發展。至於綱領之起草與討論方式，應以抗戰建國綱領為藍本。

還軍與整軍

政治協商會議於十六日開第六次大會，討論軍事問題，青年黨提出「停止軍事衝突實行軍隊國家化案」民主同盟提出「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員」案，青年黨提案要點為：(一)實行公平編遣，以建立精練之國防軍；(二)實行軍民分治，以免軍人干政；(三)實行軍黨分立，以免政爭變為兵爭；(四)實行徵兵制度，以澈底革新全國軍隊；(五)設立國防部，以統一陸海空軍之行政；(六)實行民意監督，以澈底整飭軍紀風紀。

張羣，周恩來，邵力子，曾琦，張東蓀，張申府，陸定一諸氏都發表意見，並決定由分組委員會歸納各項意見，再提大會討論，民主同盟提案，梁漱溟氏說明，謂同意青年黨軍隊國家化之主張，然

着重大量裁兵而積極從事建設現代根本國防，並主張成立一整軍計劃委員會執行軍隊國家化及裁減常備兵之任務，分期完成。

周恩來氏發言對如何使軍隊國家化問題提出以下意見：(一)同意成立委員會，負責實施整編，包括改組軍委會及其附屬機關。(二)同意全國整編，大量裁兵。(三)各抗日有功部隊應予以承認，並予整編。(四)同意青年黨主張文人參與軍事之辦法，軍事機構應不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五)改軍隊制度及教育，廢除「軍人第一」思想。(六)地方治安由地方自衛隊保安隊負責。(七)軍黨分開。(八)現役軍人不得任行政官。(九)軍費不能超過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廿五。(十)澈底解散偽軍。(十一)限期解除日軍武裝。(十二)過渡時期所舉外債，應用在建設復員方面，不用於養兵。

國民大會及代表問題

政治協商會議今開七次大會，討論今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事，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意見不一致。張厲生希望國大如期召開，俾早日結束訓政，還政於民，第一屆國大之職權，止于制憲，舊代表不可不承認，但額可以增加，並可容納各黨派人士參加，六個月內，召開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鄧穎超表示反對，謂十年前之青年，今日已有權選舉，且其時東北及台灣均未選舉，如維持原案，此種缺陷無法彌補，婦女代表亦為問題。章伯鈞亦反對維持舊代表。

政治協商會議於十八日九時舉行第八次會議，

繼續討論國民大會問題。

孫隆基氏首先發言，反對國民大會代表有效，據稱：政府之威信與當前實際政治困難要顧到，新憲法之威信與憲法之理論，亦要顧到。渠復代表民主同盟提出以下各項：(一)如維持舊代表，則須舉行民意測驗，由工商文化學生等智識份子舉行。(二)以舊代表為候選人，舉複選。(三)不開國民大會，由專家制憲，公民表決。

憲法草案研討

政治協商會議第九次會議，於十九日上午九時舉行，討論憲草問題。首由政府代表孫科，說明五五憲草之內容及其精神分述：(一)政權與治權，(二)國民大會，(三)五院制度，(四)總統制，(五)地方制度，(六)人民權利自由各點，逐一闡明。孫氏并謂：該項憲草如有需修改之處，自可容納。

黃炎培繼續述述各方對憲草內容之意見，并列舉應加考慮之問題：如(一)人民權利之法律限制(二)男女平等之具體規定，(三)五院制度，(四)總統權及副總統與行政院長問題，(五)省長之民選問題，渠贊同胡霖氏主張成立憲草委員會，聘請專家詳加研討。

沈鈞儒氏繼之發言，着重地方政權問題。傅斯年以為五五憲草內容對民權之行使與國內各小民族問題，均無特別規定。對於國民大會問題，渠認為此種制度，因時代變化，已有修正必要。渠建議：如仍採五院制，可以立法院作為下院，監察院作為上院，運用各國兩院制為國會職權，兩院名稱可

仍舊，惟職權擴大，不必有國會之名，但有國會之實。立法委員一部由國大選出，大部由人民直接選舉。監察委員由省議會選出。如此，則一面接受五權憲法之原則，一面實行兩院制之議會制度，兩者可兼顧。

胡霖氏稱，國民大會問題應否設立，大有考慮必要，蓋其職權本可由立法院行使，則無需此龐大之機構形式。創制與複決權，渠重提昨日之建議，由政協會議或由政府設立憲草審議委員會，加以研討，人數不宜過多，并限三個月內完成。

會琦亦主張組織「憲草審議會」，渠認為憲法之性質，應為柔性，并應採取內閣制，兩院制，五院制祇可保留精神，不必拘於形式。省制應採均權主義，確定省之自治地位。

楊永浚氏本日首次發言謂：地方應重於中央，自治重於行政。并強調省應為最高自治單位，省長由民選，并確定中央與省之均權制度。

吳玉章提出下列原則：(一)保障人民權利，不應用普通法律限制。(二)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採用孫中山先生均權主義、五院制度分割權力，始等於無權，致總統權力太大。(三)地方自治問題，省為自治單位，省長由民選，依照孫先生遺教制定省憲，使地方可自由發展。(四)確定國策在憲法上規定軍事上採民主精神，非軍國主義精神，使軍人為人民服務。文化與經濟方面，均應任其自由發展，不加限制。

珍貴的友情

(一) 敬啟者：前准貴社函約徵求訂戶，茲徵有黃柱等六十五戶暫訂閱半年，每份以四百六十元(郵資在內)計，合國幣二萬九千八百元，該款經由昆明中國銀行匯上附二萬九千八百元匯票一紙，訂戶姓名住址表一份，隨文函達，敬請 查照持票前往當地中國銀行兌收，將刊物按期遞寄訂戶以供閱讀，並冀見復為荷！

此致 中央周刊社

段遇乾上一，十六 通訊處：雲南景東縣黨部

(二)

逕啟者：華翰奉悉，茲由航空匯上國幣二萬三千元，訂費刊五十三份，請按期用航空郵交另紙所列各處為感！並盼將勝利紀念章掛號航交為盼 此致 中央周刊社 社友黃培國上 四川瀘縣彌陀場盧女中

(三)

文伯主編先生大鑒：此間地處邊陲，交通阻礙！民智較為低落，接奉 貴社啟事及徵求萬戶社友各一份，讀之無任欣然。經多方發動，業已徵得定戶五十份，茲匯上法幣二萬一千元正今後即即寄奉本會本人轉發，是所盼禱！專上敬請 金頌願手啟 通訊處：江西省安遠縣黨部

記羅卓英先生

段德澍

「肝胆輪困，都付飄零蹤跡，關心處，燕然風緊，龍堆日黑，豎子徒誇食肉相，書生自挾平戎策，看縱橫胡騎滿煙塵，邊聲急！家國恨，匹夫責，三尺劍，萬人敵，好從軍趁早，談兵何益？武穆胸中韜略富，南塘塞上旂旗赫，只而今，休問眼誰青？心仍赤！」

這一闕滿江紅是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先生民國七年北上從軍時填的，用以表現他的決心與抱負。他是一個富有政治家風度的軍人，是合乎儒將這一典型的人物。我此次來到廣州，初看到他穿着一身整潔的青色中山服，比起從前戎裝佩劍，風度已顯然的不同，容易給人以新的感覺。現在，他雖是從政了，但仍是一個軍人的神情。以我的揣測，羅先生亦必將他的軍中生活，作為他生活歷程中最寶貴最重要的一環。

自民國七年他就北上從軍，一直到四年前才停止，其中將近三十年的時光，所經歷的幾乎盡是戎馬疆場的

生活。當最初從軍的時候，正是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末期，軍閥割據，邊患亦急，國內是弄得不成一個樣子。他慷慨激昂，把內情外感雄心壯志，填入篇首的詞裏，寄託至深！

不久，他投入的參戰軍改為邊防軍，針對當時情狀，又填了一闕滿江紅以見志：

「慷慨從軍，柳營外旂旗壯色，率記取，他時欣受將軍符節，萬里長風宗憲，廿年絕塞蘇卿雪，莽神州多少好男兒，真豪傑！堅而銳，牙頭鐵，騰而沸，心頭血。看馬蹄到處，單于遁穴，古驛蔭存唐代樹，荒原光照漢家月，算軒轅神霄致中興，揚威烈！」

他那時以青年書生，憑一腔熱忱，離鄉背井，慷慨從軍。軍中生活本來就很艱苦，兼之北地嚴寒，風雪交加，下操及室外運動時，兩手凍得發腫，連扣皮帶也扣不起來，每日飲食也不過饅頭與白菜湯而已，課餘并服各種雜役，勞過不了，在這種凍勞之

下，總以「人家能够受得了，我為什麼不能受？」二語來反問自己，以精神克制的方法，無形的消除凍勞的苦楚。

從軍以後，最初被派擔任的職務，是充當下士副班長。他提到那時的情形說：「心裏真是驚喜交集」，又說：當時因為「自己還是一個新兵，而今就要出來帶部下，教部下，一種戒懼的心情沉沉的壓着我，但是「事在人為，忠勤謹慎的做去，總可達成任務」。這麼一想又放心了許多，那班兄弟，都是來自田間的農民，多屬文盲，說話方言又重，南路北調，初有格格不入之感。不過，他們本質純良。我視他們有如手足，所以大家相處極為和洽。」

後來，離開了部隊，轉入了保定軍官學校，當了軍官候補生，這時候有幾件事給他以深刻的印象：（一）教育長劉竹坡先生方正嚴肅，教學生以革命救國的道理和方法，并介紹李塔先生的實踐之學。（二）五四運動高潮澎湃，保定軍校雖是軍事學校，

受了嚴格軍紀的管束，但學生愛國思想，仍是奔放怒騰，三民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等，在那裏形成了蔚道伏流。他那時即已接受三民主義的理論，發生了信仰，已常常與志同道合的同志約在一起，秘密討論革命救國的方法。（三）在校演習卸炮駁載的時候，因為北方驃馬既高且大，他與站在排尾的同學，體高僅及馬背，要豎起腳跟，伸直兩手，用出全身氣力，才能把炮頂上馬背，一般同學與教官都覺好笑。在演習野外騎乘時，經過的時間過久，路線又長，北方灰塵特大，親歷了「黃塵沒馬頭」的景象，歸來下馬，大家臉上都已塵厚盈寸，變成泥塑的活菩薩，同學們取鏡互照，禁不住彼此大笑。

民國十三年 國父改組本黨，建立黨軍，革命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羅先生已早畢業保定軍官學校，就在廣州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起初，擔任第一師炮兵連連長，以「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的態度去帶部下，並和他們同生活共甘苦，事必躬親

中國清代史專家蕭一山先生，一般人雖然知道他是一個權威的學者，但是對於他的詳細情況却知道的很少，在他未來西北大學充任文學院長以前，一般同學的想像，以為他一定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但是當他第一次出現在大禮堂的講壇上的時候，却使的大家目瞪口呆；因為他完全出人意料，是一個四十九歲的紅光滿面而且相當肥胖的中年人。他穿着藍中山裝，外套一件同樣顏色的呢子大衣，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付鑲黑邊的眼鏡，活像蘇聯的大元帥高伏洛夫。他的個子相當高，一口

的徐州口音，講演時聲調洪亮，很有吸引聽衆的力量，所以當他第一次在四大公開講演，敘述他參加第一屆參政會的觀感時，連大禮堂的窗台上都擠的水洩不通。

蕭一山先生是江蘇徐州人，乃父在清朝的功名相當高，而且是一位好學之士，關於清朝的史料保存的特別多，這也是他所以成清史權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也正因為這種原因，所以有些存心侮蔑他的人，說他清代通史，出於乃父的手筆，其實這完全

是一種無稽之談，因為如細把他去年出版而榮獲教育部學術獎金的清史大綱與二十年前的清代通史比一下，即可證明兩者實同出先生之手，因為無論在文筆及其他各方面，並沒有一點不相同的地方。

蕭一山先生是一個天才極其出衆的人，他十八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廿二歲畢業，他的清代通史便是他的畢業論文，因此梁任公在清代通史序中，稱讚他的天才說，在晚近的幾百年內，只有顧亭林可以與之媲美。由

人物剪影

西大的文學院長——蕭一山先生

汪洋

此可見先生才華的卓越了。他的清代通史問世以後，立時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從此一躍成名，當他到英國留學的時候，他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已經穩固不移了。

蕭一山先生的史觀是民族革命史觀，他反對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主要力量的說法，因此他的哲學思想是中庸的，而不是唯物論的；關於蕭先生的哲學思想，他自己曾著有中庸的哲學一文，刊登大報上，這裏不再贅述，對於中國近代史，他把它分做三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太平天國時代，以洪秀全為領導人物，第二階段是辛亥革命時代，以孫總理為領導人物，第三階段是抗戰開始到現在，以蔣總裁為領導人物。前兩個時代是漢族反抗滿族的時代，第三個時代是中華民族反抗大和民族的時代，儘管時間不同，而其推動歷史前進的，却同樣的是一個「民族革命」。

蕭一山先生和梁任公一樣，把歷史都視為「經世」的工具，因此他也和梁任公一樣，對政治發生着極濃厚的趣味，他常常對史學系的同學訓話說：「史學就是政治，從事政治而不熟諳歷史的人，永遠不會成功。」過去他曾經幾次連任國民參政員，對政府重工輕文的教育政策屢次加以批評，建立下不少的功績，最近復應李宗仁將軍之邀，擔任北平行營秘書長，這個消息方發表時，有些人表示詫異，其實我們如果把他素日的思想與主張作一個總的考察，就明白這件事並不偶然；不過蕭先生平日是最痛恨貪官污吏的人，他即使從了政，也不會踏他們的舊轍而貽害社會的。

蕭一山先生和梁任公一樣，把歷史都視為「經世」的工具，因此他也和梁任公一樣，對政治發生着極濃厚的趣味，他常常對史學系的同學訓話說：「史學就是政治，從事政治而不熟諳歷史的人，永遠不會成功。」過去他曾經幾次連任國民參政員，對政府重工輕文的教育政策屢次加以批評，建立下不少的功績，最近復應李宗仁將軍之邀，擔任北平行營秘書長，這個消息方發表時，有些人表示詫異，其實我們如果把他素日的思想與主張作一個總的考察，就明白這件事並不偶然；不過蕭先生平日是最痛恨貪官污吏的人，他即使從了政，也不會踏他們的舊轍而貽害社會的。

曾出必行，把軍營作為家庭，真是做得到「親愛精誠」四個字。當時并親自擬了一副對聯，掛在連部的前門，這聯是：

「到此便一家親，長官若父兄，士兵若子弟；

成功只兩句話，打仗不怕死，做事不貪財。」

此後，參加北伐，剿匪，抗戰諸役，功業彪炳。並於抗戰最後階段，舉動軍事幹部訓練，奠立勝利反攻之基礎。其統率遠征軍，轉戰滇緬一帶，尤對盟國有重大之貢獻，博得國際聲譽。擔任青年軍編練總監，益受全國智識青年熱烈的崇敬。

由於上述，在其軍中生活的斷片中，充分表現他的英雄肝膽，慈母心懷，實在是一儒將的風度，永為我們的典型。過去，治軍或訓練幹部的時候，總以朝氣，志氣，勇氣來策勵部屬，其解釋為：

朝氣——蓬勃活潑，志氣——繼往開來，勇氣——冒險犯難。

現今，蕭先生雖是主持省政，其用人標準，仍着重操守與朝氣，對於青年寄以無限的希望，鼓勵人家不避艱險，力圖進取，底於成功。不論他從軍也好，從政也好，其為人治事仍是一貫的作風，即是以愉快的心情，腳踏實地的去做艱鉅的事業。他常常喜以：「任務中研究，樂觀中奮鬥，累積中成就」三語自勉并以勉勵同志，我們也可看出他的作風來！

我們景仰一個人，就要學習他的精神與長處，從其艱苦奮鬥的過程中體會他所以成功的祕訣。因此我們在這裏特別請出蕭先生來，為我們青年作一個楷模！

我生平所最愛讀的書——傳記 (下)

朱 晨

七 大發明家發現家故事

首先聲明：這是一本人物故事，而不是傳記。不過我認爲寫科學家的傳記，往往是不容易討好的多，如果太偏重科學的事實，讀了就難免令人生厭，否則又有失寫作的意義。這本「大發明家發現家故事」，則可謂恰到好處，儘管文章的體裁不同，它的內容還是近於傳記的，不過筆調稍帶輕鬆，和敘述略嫌簡短而已。本書中各篇的描敘，大體均能引人入勝，舉例，如寫萬有引力發現者的牛頓，著者這樣開頭：

牛頓小的時候，也同別的孩子一樣，時常向祖母討錢用。不過別的孩子是拿了錢買玩具和點心，他却不同，他拿了錢立刻到五金店裏買些合用的鋸子和鐵錐一類的東西。……牛頓實在很愛手工，他年紀還小的時候，就有了許多收拾得整齊齊齊的本匠傢伙。

這種描寫，手法新穎可喜，牛頓後來出身劍橋大學，充任教授及造幣廠廠長，故事中於描寫他幼年入學以後的情形說：「每天回來，總跑進小

屋子裏，鋸木敲釘，忙着做發明的東西，可見發明一事，決非偶然，而是累積一朝一夕的艱苦工夫而成功的。

愛迪生這位大發明家尤其了不起，他發明留聲機，電燈，活動電影，有聲電影等大小不計其數，一生取得發明的專利計有一千三百二十八種，平均每十一日發明一種，但是我們考查他小時候的生活經歷，只是賣報販子，一種火車上小規模新聞週報的發行者和鐵路電報生，故事中這樣寫着：「在學問中，愛迪生最歡喜的是科學實驗。平時，他把零用的錢都買了藥品與傢伙，搬到家中的地窖裏，把試管倒來倒去，求他自己的樂趣。地窖的門上，掛了「愛迪生研究室」這樣一個牌子。這是與牛頓頗相類似的科學家的幼年生活縮影。

固然科學家都是以從事不斷的實驗和研究爲他致力發明的基礎，而從事實驗和研究，非藉高深的學問和廣博的科學知識爲之幫助不可，但事實則未必一定如此，前面的愛迪生已是一個例子，他如電的發現者佛蘭克林，他自幼家境不好，小學只讀了兩年

就輟學了，之後也不過是印刷局的助手和報館編輯等，可是因爲由於他發現了「電」這東西，使世界有了電燈，電話，電報，以及其他用電的機器，在人類文明史上，確算一種不朽的貢獻，無怪著述者要這樣推崇備至，他說：「美國雖然還有很多偉人，可是只有他，使美國發達到這樣健全的地步；非但是美國，普天下，沒有不受他的恩惠的。」

炸藥發明者諾貝爾，他八歲才進小學，綜其一生，所受學校教育不過一年餘，但你不要以爲他沒有接受過高深的學問和知識，就輕看了他那份偉大的成就，誠如著述所稱道的一樣，「他發明這東西的目的，並非金錢，他是要爲人類添一文明利器——威力大而危險少的炸藥」。諾貝爾因發明致富，可是臨終前，他却捐出了他的全部財產，作爲後世的文化與和平設置獎金之用；「我是世界的公民，我爲世界人類而生」；他說這句話，同樣，他也力行了。

在本書中，其他的科學偉人故事，倘有發明家遠鏡意人伽里略，發明

蒸汽機的英人瓦特，發明輪船的美人富爾頓，發明火車的英人史蒂芬孫，發明飛船的德人齊柏林，發明電話的英人倍耳，發明鑄錠的波人居禮夫人，發明飛機的美人萊特兄弟與法人發爾曼，發明無線電的意人馬可尼和發明火車掛鈎的國人盧天佑。譯者曾慨乎言之：「中華民族除了火藥羅盤的貢獻以外，於全世界人類都有益處的，恐怕要算詹氏的掛鈎了！」固然我們引此爲榮，但同時我們實愧於對世界的貢獻太少！

發明可以促進世界的進步，增進人類的文明，世界也惟有從事於發明的科學家，最受人類的崇敬，本書中所收諸發明家的事跡，不啻一本科學界的發明簡史，文字優美，猶爲餘事。

八 張居正年譜

張居正年譜，滕山先生著。總裁在張江陵全集序言中云：「江陵平生服膺子產及武侯之嚴法，其志趣已可概見。若論其功業，江陵殆有過之。年譜，按年譜敘，有史實而無議評，文字既可不加藻飾，事實原原本

本，但使重大的史實，不稍掛漏，可謂已盡年譜的能事，至於材料的收集，當然又是另外一件事，本書自明世宗嘉靖四年乙酉（紀元一五二五），張居正生，至萬曆十年壬午（紀元一五八二）張居正卒，歷五十八年的一生紀事，均詳盡包舉。綜江陵先生一生，二十歲會試不第，二十五歲授翰林院編修，三十歲起告假，山居養病，三十五歲復出，四十三歲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明年加少保太子太保，又明年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四十七歲典試會試，明年加少

師兼太子太師，四十九歲支正一品俸，進中樞殿大學士，五十二歲加進左柱國，陞太傅，五十七歲加柱國太傅，五十八歲卒，贈上柱國，諡文忠，先生自三十五歲服官起，歷世宗，穆宗，神宗三朝，由編修歷遷至大學士，并加柱國太傅，追贈上柱國，可謂極盡哀榮；雖然如此，他也並不是一帆風順，中途沒有半點波折，如在萬曆四年丙子（紀元一五七六）那年的正月，巡按御史劉臺劾先生專擅威福。……因謝政，伏

文伯先生賜鑒：

日寇屈膝，勝利歸來，得親貴刊，如親文几，藉聆謔論，曷勝欣慰。弟等濫等湘省訓團，自維才輕責重，隕越時虞，敬希訓迪時頌，藉有適依，無任感幸。茲有鄙見一二，敬陳如次，想賢者不以嚙舌罪責也。

一、內容擬請增加指導青年中心思想之專論及介紹各國政治思潮之譯文。

二、

擬請盡可能加插時事畫片。

四、封面設計及編排均嫌呆板，擬請改善。

本團開訓在即，弟等願義務發動學員，集體訂閱貴刊，特先奉聞。天寒日漸，諸請為國珍重。專肅敬請

文安

弟劉琳森 向 峯同上 十二月廿八日
賜教處：長沙湖南省幹訓團訓導處

長沙來鴻
對本刊的建議

三、
· 尊重讀者意見誠意接受批評。
擬請開欄
解答各項
青年實際
問題。

地不起。帝為降御座掖之，慰留再三。先生猶不出視事。……二十六日，上遣司禮太監孫隆賈手勅宣諭，乃起。上喜甚，遂詔臺下獄。仗之百，遠戍之，先生復上疏救，乃除臺為民。

又年譜萬曆三年己亥（紀元一五七五）先生五十歲記：
五月，先生以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範，在於督學之臣，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小輕授，因疏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初三日，奉旨，卿等所奏，俱深時弊。

這是先生對於培養人才的主張。先生那官清廉，則可舉下列二事為證。年譜載：
萬曆七年己卯（紀元一五七九）先生五十五歲。二月，番夷求貢，奉番書禮物於先生。先生以通貢大事，不得私受，遂歸之於上。令納之。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為甯遠伯。先生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餽以金，先生曰：爾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

先生對國事一秉至公，并不因臬上的送予加功晉爵，贈賜金帛而有所稍異，茲特舉下事為例。年譜載（萬曆七年）：
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用，詔部鑄大錢以進。十九日先生疏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翌日，上從之，乃罷鑄錢。

四 我對於傳記的兩點認識

一、我認為傳記是一種最

適宜最有益的讀物

傳記是一種寫實的東西，歷史性的敘述太缺少感情，小說中的佈局又多空中樓閣，傳記兼有兩者之長而無其短，人物是實有的，敘寫可寓感情於文章之中，何況傳記並不是一種說教的書，它所描敘的主人公是一個活生生實有其人的人，他的一生，使你受感動的地方自然很多，他的一切好的行為和偉大的事跡，無形中使你會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再則傳記所描敘的都為一代的人物，至少也是一個有所為的人物，軍事，政治，科學，文藝……無論他或她是屬於那一方面

的好，反正多少你都會獲得一點關於他或她所熟習那一部門的學問知識，如果傳者除記述事實以外，兼有優美的寫作技巧，則在吸取它的內容以外，我們更可以獲得文學方面若干的修養和欣賞樂趣！

二、我認為要發展傳記文學首先應該提倡自傳的寫作

「傳記是中國文學裏最不發達的一門」，胡適之先生在序張季直傳中說過這句話，可是時隔十餘年，情形還是差不多。胡先生是提倡寫作自傳的一個人，他自己也曾完成一本「四十自述」，在提到關於寫作自傳的目的時，他說：「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這正和陸丹林先生最近所發表的意見一樣：「一個人如果對於國家社會，有特殊關係的應該自己設法寫述自傳，較之死後別人代寫來的正確，雖然自己執筆，不免有些是鋪張，有些是隱諱，能够忠實的自白的却不多見，其實鋪張與隱諱，即使他人撰著，也多中了此病，那就不足為自傳的缺憾了」。這是把傳記寫作的利弊比較來看，立論更見深刻。朱東潤先生的見解也很透澈，他

說：「任何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行為，悲歡離合，因此任何人的生事都可以寫成一部極好的傳記」。以上諸論，都為提倡自傳的寫作的。個人也以為一本好的自傳其價值是可以超乎其他傳記的，理由有三點：第一傳記須求真，而一個人所知莫如己；第二他人敘寫的傳記，不是誇張過甚而失實，便是觀察錯誤而低減價值，自傳有其淳樸的作風，誇張不足以炫其博大，自述短處反使自已有一個省察的機會，勵已同時勵人；第三一種事業的成功或失敗，主要關鍵，往往有繫於若干細微節處者，如果由一個人來自已從頭至尾道出其始末和經過，總比一個不熟悉內幕的人來勉強湊集些不完整的材料去寫出要好得多，完備得多些。其次，提倡偉大人物口述的自傳（如蔡子民先生傳略就是），也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因為第一是記述的範圍非常廣闊，凡軍事家，政治家，科學家，實業家，學問家，甚至戰場上的無名英雄，都可以給我們這時代留下一份最光輝的記錄，都可以作為我們寫成口述自傳的好主人公（如徐盈先生在新中華連續發表的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實與傳記的性質已頗接近），更何況人的生涯是短促的，與其在人作了古以後，再去發掘他生前所經歷的一切，和回憶他在世時

的聲音笑貌，何如趁他在世的盛年或晚年，使其人作略而不遺的口述之為愈呢！而且其真實性的程度或者可達十之八九傳記；主要是有真實的材料，但材料到那裏去找呢？義丐武訓傳的作者張默生先生在他寫完武訓傳後於附記中曾感嘆的說過：「無奈他（指武訓）在世為人，最是可歌可泣的時候，反不為世所重，無人為他作一起居注」。故流傳下來的事蹟總嫌太少」。我們寫作自傳，為的是給史家做材料，胡適之先生的話是不錯的，所以即使不寫作自傳，也當把他自己一點成就的事蹟，設法保留下來，再萬萬不得已也要親口傳述，由他人代為筆錄，能够這樣，一定可以引起多數人對傳記的注意，那是無疑的。

五 我的希望——

部有歷史意義 包羅古今的巨 大傳記

西諺有曰：「一切的開始與結束全是人」。可不是嗎？一部歷史的編成，還不就是幾個人，幾個有數的人。不久以前我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新聞，說美國在最近完成了一部包括自國以來一萬二千餘歷史上有名人物的大傳記，分由專家多人執筆，每篇自萬餘字至數萬字不等，按美國立國至

今，總計還不滿二百年，在這不滿二百年的時間當中，就選出了萬餘歷史上有名的人物，目的當然不外表彰先人垂範後世，但這一工作是偉大的，也值得我們注意的。我猜想這部巨著一定是定了計劃，絞盡了多少人寶貴的腦汁，耗費了多少人有用的時間而後才完成的。由此我更聯想到幾個問題，就是：我國立國五千餘年，代有名人，其豐功偉烈的事蹟，何一不足以為世楷模，似乎也該有這麼一部巨大的傳記才對，這是一；根據前人所遺留下的史學和文學中關於傳記的散篇作品和整部著作，以及近人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對於傳記這方面的成就并不算遜色，但是在目前却沒有看見傳記前途發展的跡象，如果我們確認為有發展傳記使其在中國文學史中造成燦爛光輝之一頁的話，則首先就應該把舊有的作品設法整理出來，沒有內應該添列，不全的應該補充，釐訂編選和寫作的計劃，期可完成一部偉大的傳記代表作，這是二；在我國的文史部門中，能够對傳記發生熱烈興趣和有獨到研究的學者，寥寥可數，對這少數學者，國家應特別予以獎助，明使能專心從事於中國新傳記理論的創造和若干偉大傳記的編寫，這是三。末後，我由衷的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將完成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包羅古今各式有名人物的巨大傳記。

天南地北

我們所乘的輪船，在夜色蒼茫中到達宜昌。船剛靠妥碼頭，便有力快來招攬生意，他們的漫天要價以及少一個錢不挑的蠻橫態度，起初造成我對收復區民衆的反感，認爲他們的跡近要索的行爲，是在敵人佔領期間所養成的風氣的遺留，當時頗爲憤憤，後來才知道由於勝利後物價的扶搖直上，使得這些拿勞力換飯吃的人幾乎無以爲生，不得不和客人多爭幾個力資。踏上岸，便看到滿街都是來往的行人，雖然沒有電燈，但透過商店食堂和攤販上的電石燈香油燈，我們可以看到各處都塞滿着顧主，四面泛起喧囂聲，這正是夜間的鬧市。當晚我們跑遍全城，沒有得到任何旅館主人的收容，終於不得不借住在一座天主堂所有的房子裏。

復員東下輪船所停泊的收復區第一個城市，便是宜昌。在敵人的魔掌之下，宜昌市民接過了漫長的四個年頭，當年的鱗次櫛比的房屋，有的燬於敵機的轟炸，有的被敵人縱火燒去，至今只存有一兩條完整一點的街道，其餘皆成敗瓦頹垣，極目俱是劫後景象，當年全城擁有四五十萬之衆的人口，經過敵人的濫施搜捕與無辜殺戮，有的死了，有的流亡他去，截至勝利

的前夕，只不過剩下寥寥數碼人，這一羣倖免於死的老弱婦孺，還賴有天主教堂神父們的庇護，方才保全下來。對於反抗強暴，宗教固然多半抱着消極的觀念，但自人道主義出發的宗教熱誠，確也能使少數人得救。在宜昌陷敵期間，天主堂的外籍神父迄未離去，他們利用教堂的房屋，盡量收容教友和不信教的民衆，使被收容者得免於敵人的毒手，神父們爲了保護這羣受難者，曾經備受敵人的侮辱與留難，宜昌區主教顧學德神父（比利時籍）就忍受過敵兵的耳擱，終於被送進

使人確信，凡善良者將永存，而暴戾則必定歸於毀滅。

宜昌的敵軍，於去年九月三日正式簽降，民生公司駛進宜昌的第一艘「生存」輪，恰在前一天到達，隨輪同來的民生宜昌分公司經理袁子修君，每與人談起這次冒險的航行，便興奮異常，當時三斗坪至宜昌間的航路，根據海軍方面的勘察，尚有若干水雷需要掃除，「生存」輪的直放宜昌，原係試航性質，一路並未遇雷，可謂幸運，大概以前所埋佈的水雷，歷時過久已經失去性能了，據袁經理談，

宜昌十日

友梅

上海外僑集中營去，我們到達宜昌前「生存」搖岸時候，立刻便受到岸上民衆的鳴炮歡迎，人數雖不多，那番重見自家人的熱烈情緒却是令人深受感動的，尚未離開的敵軍，則站立在不遠處，冷眼看着當前的動人景象，沒有出來干擾，當時宜昌找不着一家飯店和旅館，連食物都不容易買得到，「生存」輪上的乘客，只好留在船上吃從萬縣帶來的青菜。

如今宜昌雖距繁榮尚遠，然已遠非數月前的淒涼情形可比，簽降以後，避難他去的民衆，都陸續回來了，

他們在一片瓦礫的廢墟上，從新建築起新的房子，經營旅館、飯店以後各色各樣的買賣，更由於川江冬季水涸，不能航行大船，必須分段接運，宜昌成了換船的碼頭，過往的商旅，經過此地都不能不有幾天耽擱，因而益發形成了生意上的熱鬧，不論飯館澡堂，家家客滿，這是商人們千載一時的良機，他們要借此掙上一筆錢，作爲正式復業之用，據某旅館的茶房周某告訴我，他們這家館店一天可以做十幾萬塊錢的生意，至少看五六分利，每天便淨賺五六萬元，一個月可以賺上一兩百萬，只消做上半年，老闆便發財了，生意的利息，既是這樣的引誘人，因而大家都在忙着找地皮蓋房子，穿過全城，到處都可以聽到一片斧鑿叮噠聲，營造廠的木匠們忙得應接不暇，木料磚瓦成了奇貨可居，一天天的在漲價。

苦的是一般住家戶，回到城裏來，看到房子燒了或者倒塌了，連個落脚處也找不着，幸而留得一椽半椽的，便略加修葺，將就着住將進去，但物價這樣高，職業一時難找，做生意手頭又沒有本錢，生活實在難以支持，他們渴望政府能給他們一點救助，只是「聯總」和「行總」都還未注意到這一點。縣地方當局固然已經在辦抗戰時期民間損失的調查與登記，可是等到賠償費或者救濟金發放下來，要等到那一年那一月呢？如果受破壞的城市

了。急功一，專說行也，，所配各要，
 近心，周趨，多刑做更從的來區也，
 來理甚旅以少前假全時了宜有未對。鄉專自，
 江，至客上文的化向間僅動點此他。在便是人署和。
 水有於到了。氣路他有了，刻。外駐會事和。
 日些十了。息具一的的全備已。而有一慢縣政
 落人天宜，報他一的城縣沒。激一慢縣政
 宜了個，才會明厥夜員交通困難的實况，
 漢大月，才會明厥夜員交通困難的實况，
 開木。宜明厥夜員交通困難的實况，
 的船宜明厥夜員交通困難的實况，
 輪，漢公夜員交通困難的實况，
 船非公夜員交通困難的實况，
 在中途旅常有困難的實况，
 途旅常有困難的實况，
 下旅常有困難的實况，
 的漢關的實况，
 月有，只是，
 有數難是，
 起，時有汽江
 想來，時有汽江
 留事，時有汽江
 在重傳，不，
 的歸心，帶地
 入，需從物，
 需從物，
 要從物，
 春客依，
 水漲才，
 漲才，
 來，

家振曹 蔣長黃 (任主)清絲鄭



廉可曹 曹 曹 廉 廉 廉



應如行

曹國天

本社爲便利江浙兩省訂閱本刊起見，特聘鄭清同志爲江浙區外勤業務主任，曹景梅等七同志爲業務員，向江浙兩省各地徵求訂戶，其報費可全部付交該業務員等，或由被寄報給者本社登記之正式收據，俟所收刊費交繳本社後，本社即當將本刊寄發，茲爲簡便起見，特聘業務員照片刊載於後，即希各訂戶垂青是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掛號字號三號

中央週刊 第八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發行者 中央週刊社
 社址：南京柳府街十二號
 電話：二一八九五
 電報掛：二四二九九

主編 張文伯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南京珠江路
 電話：二一九六七

定價 每冊國幣七十元
 訂閱：三個月 一元八角
 半年 二元五角
 全年 四元五角

南京總經售：和平書店
 地址：中山東路一六〇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廣告刊例

地位	全頁	半頁	頁	1/4頁	彩色
封底	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	面	面
內封	五六〇〇	二八〇〇	一六〇〇	面	面
正文前後	四〇〇〇	二四〇〇	一二〇〇	面	面

聯合廣告地位1/8每期國幣一六〇〇元

歡迎：
 訂閱！批評！
 投稿！經銷！